

●历史教育教学研究

口述史在高校“四史”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郑京辉 吕书额

摘要:口述史教学注重知识的学习、实践与研究的三位一体,有助于打破课堂与社会的界限,拉近历史与生活的距离,培养学生各方面实践能力及核心素养,并有利于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提升。而“四史”口述史教学因其近时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实施途径主要有“嵌入式口述史教学”与“课程化口述史教学”两种方式,其教学模式的构建主要任务包括:口述史项目实践、资料整理与利用、教学理论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口述史运用到教学实践,探索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的口述史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口述史;“四史”;教学改革

202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2020]6号),其中关于课题目标体系中提到: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重点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识世情、国情、党情。^①高校开展“四史”教学意义重大,但如何落实更为关键,而口述史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即探讨以口述史教学为途径的“四史”教育在高校的落实问题,并着重探讨高校“四史”口述史教学模式构建中的主要任务、目标及面临的问题。

一、口述史教学的作用及意义

口述史学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新方法、新理念,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兴分支学科。^②口述史教学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保存国家、民族及民众记忆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有助于学生从新的角度对历史的再认识,及历史学科的重新定位

传统历史教学模式往往使学生感到历史离他们的生活很遥远。很多高校为了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组织学生到博物馆或历史遗迹实地调研参观,或者邀请如抗战老兵等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走进课堂,这些活动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感悟、认知历史,扩大和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拉近了生活与历史的距离,也受到学生的欢迎。不过这些活动中,学生仍然处在消极被动的地位。而口述史可以让学生参与到历史构建当中,通过对历史当事人的访谈、记录及资料的分析研究,使其成为历史的记录与撰写者,一方面可以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培养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对历史认识获得一个全新的维度,即历史不再是那些自己感受不到的教科书的说教,而是可以为个人亲身经历的往事。

*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2021—2023年度实验室建设与资产管理研究项目“影像史学实验教学探索研究”(SY2021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京辉、吕书额,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邮编065000)。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开·重要文件。(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012/t20201231_508361.html)

②周新国:《口述史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设置》,《光明日报》2017年1月16日,第14版。

2. 有助于“四史”教育目标的落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四史”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落实。新时代背景下的“四史”教学,应注重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相对于传统政策宣讲、课堂知识灌输,口述史教学是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对培养学生爱党、爱国,促使“四史”在其心中落地生根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历史教学模式中,学生更多的是被动的知识的学习和记忆。而口述史实践教学可以打破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将静态历史教学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动态活动。同时口述史教学强调的是知识的学习、实践与研究三位一体,特别是可以让学生参与进历史的记录与撰写,甚至是在“重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从而培养其学习的主动性与成就感,实现从“硬背历史”到“感悟历史”的转化。

3. 有助于学生各方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说,口述史教学还可以让学生的组织、交际、调查、语言文字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训练和提升。口述史不同于新闻采访,也并非很多人所理解的仅仅是谈话聊天,而是有其一套系统、规范的操作流程,访谈者需要接受系统的培训才可最大程度上保障所得口述史料的有效性。比如,访谈前的选题,需要学生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与把握,之后需要查阅教科书之外很多的文献资料去深入了解选题的背景,同时设计自己的访谈提纲,从而促成传统课堂的知识灌输到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转变。再如,确定选题之后,需要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寻访、联系受访者,建立联系并开展正式的口述访谈,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交际等能力,而访谈之后的录音需要进行文字转化、整理,形成正式的口述史文本,这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字能力。此外,在进行口述史教学中还可以将口述史项目与学生学年及毕业论文联系起来,进一步加强对访谈资料利用及分析研究,这也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4. 有助于打破师生间固有角色,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

口述史的实践教学往往以项目为依托,按照群体合作的方式设计,需要的是团队合作。特别是口述史项目的开展,从最初的选题、背景资料搜集、访谈,直至最终文本的形成,不仅需要团队同学之间的协作,而且师生之间的共同探讨与合作也突破了传统师生

间的等级关系,给他们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促使师生成为更为积极的教学相长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教师由一言堂的授课模式向启发式教学的转变。以选题为例,以往口述史实践中,通常选题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学生自由选题,二是由老师指定题目。不过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学生自主选题,可以使其获得最大的主动权,选择自己感兴趣和自己比较了解的题目,弊端在于学生相对缺乏审核判断能力,或者选题为老师所陌生的领域,致使题目不切实际,或者因缺少老师的指导而操作艰难。由老师指定题目,优势是教师可以更好的掌控整个项目,便于指导,不过这常常造成学生简单被动的完成老师指令,从而失去口述史教学中的互动过程。因此,口述史教学实践中,教师作为团队的一份子应与学生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教师参与整个项目的策划并指导全过程,学生则肩负着实际操作的责任。故此,就选题而言,杨祥银主张其最佳的方式应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背景研究,共同讨论来确定主题。^①

二、高校“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开展

口述史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录音和录影等现代科技设备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教学可理解为,结合教学理论和方法的解释与探索,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一项口述历史项目。^②“四史”由于其近时性的特点,将口述史方法运用至“四史”教育教学中,更能突出其优势与价值。

1. 口述史实践的时间局限性及“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可行性与紧迫性

众所周知,口述史是记录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故此,口述史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强的时限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口述史具有不可再生性。以抗战老兵为例,抗战胜利至今已70余年,目前健在的抗战老兵多在90岁以上。2015年,南京师范大学抗日研究中心、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与南京民间志愿者联合会,启动了“抗日老战士口述调查”项目,至2018年6月共采集了1012位抗战老兵口述史影像资料。但据项目组统计与介绍,随着时间流逝,对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访谈,赶不上老兵们离世的速度,很多老兵约好了时间,还没来得及访谈就已经去世,而采访的老兵中,也已有167位

^{①②}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第116页。

老兵离世。^①又如以笔者参与的二战时期“安野事件”为例,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政府、侵华日军联手日本企业将38,935名中国男劳力强掳去日本国内35家大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其中360名青壮年男劳力押运到日本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抗战胜利之后幸存者才得以归国。上世纪90年代,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刘宝辰教授开始二战被掳劳工的调研,并在一些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开始长达十余年的索赔诉讼之路,师生足迹遍及京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十多个省市,联系到160多位“安野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其中69人健在,但到2009年和日本西松公司达成和解,在济南补偿金首发式上只有30余人健在。^②故此,在开展新中国之前的口述史项目时常常面临受访者难觅的窘境。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阶段“四史”口述史因其近时性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几经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资改革、国企改革、家庭婚姻等很多口述史课题大有可为。通过口述史,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制度结构下微观个体的生活与情感,并更深刻地感受到总体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传统社区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冲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中国阶段口述史的紧迫性。以笔者参与的王国藩与“穷棒子”合作社口述史项目为例,以王国藩(1919—2005)这代人为坐标,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批人正值当年,也是合作社的发起者及骨干。但从年龄上分析,新中国成立距今已70余年,王国藩同龄人健在者多已近百岁,寻访已十分困难。故此,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不得不将寻访的主体转移到王国藩这代人的后人身上,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成长起来的这批人,通过他们的回忆与讲述,重新去构建还原其父辈发起、创办合作社的那段历史。

2.“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实施途径

“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嵌入式口述史教学”,即作为课程教学的有益补充,以课外实践的形式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嵌入到历史课程教学中,二是“课程化口述史”,即开设专门的口述史课程,开展以“四史”为主题的口述史

项目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两种实施途径在全国各高校中都有实践,各有利弊。

(1)“嵌入式口述史教学”。在各高校的教学实践中,“嵌入式口述史教学”实施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邀请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现场讲座,比如在讲授抗美援朝战争或新中国合作社运动等某个主题时,可以邀请曾参加这一战争的老兵或当年参加合作社的社员走进课堂,讲述他们的所经所感,由此让学生更深切地感触那段历史。二是根据课程教学的进度与需要随机性地组织学生以课外实践的方式开展口述史活动,这一方式既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课程内容随机组织,亦可在课程结束后选择国史中某一事件或问题以假期实践的方式开展,并完成相应的调研报告。

这种“嵌入式口述史教学”,优势在于形式自由灵活,和课程内容结合程度高。不过其重点并不在口述史,而是作为课程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凭证与课程内容相互验证,以此帮助学生理解与强化课堂讲授的知识内容。其弊端,一是缺乏规划,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二是学生多未接受正规的口述史训练,既不了解口述史的意义,也不清楚口述史项目开展的操作方法,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将这一实践活动当作负担,应付性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即便一些学生有心从事这一项目,不过因缺乏专业的知识与指导,实际操作中常常困难重重,而这种状态下所得口述访谈资料史料价值也极为有限。

(2)“课程化口述史教学”,也就是将口述史作为学分课程列入培养方案,纳入正式的课堂教学。这一口述史教学的实施方法,其优势在于学生可以接受系统、规范的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培训,开展较大规模的口述史项目,同时可将口述史课堂教学、项目实践及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深化“四史”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科学研究能力。课程化口述史教学在一些高校也多有实施,以笔者口述史教学设计为例,这一课程共计40个学时,其中课堂教学30学时,课外实践10学时,共16周。以一学年为例,前8周计16学时为口述史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课堂教学。之后6周计12学时进行口述史项目的选题、背景历史知识的学习及资料搜集,以及访谈计划与提纲的拟定。再之后利用学生假期等课余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正式的口述史访谈,取得

①《南京民间力量与时间赛跑,参与抢救1012位抗战老兵口述史》,《南京日报》2018年7月8日,第A02版。

②郑京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劳工民间诉讼的困境与突破》,《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访谈资料后指导学生进行转录及整理,形成正式的口述史文本,其中对部分口述史访谈的内容,必要时教师可要求进行二次访谈。当然,“课程化口述史教学”并非随着课程的结束而结束,教师还应当积极地指导学生利用口述史资料完成学年或毕业论文,提升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并提高口述史料的利用率及成果化。此外,还应注意对口述史资料进行整理归档。不过“课程化口述史教学”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需要一定的师资力量,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需要学校及学院的认可与支持。

3.“四史”口述史教学的主要任务、目标及问题

“四史”口述史教学应注重教学、实践与研究的结合,具体而言,包括口述史项目实践、口述史资料整理与利用、口述史教学理论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四方面的主要任务。

(1)指导学生开展“四史”口述史项目。其主要目标:即通过口述项目的开展,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强化学生“四史”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并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实践能力;面临及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口述史访谈的方法与技巧,并最终获取有效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研究是一项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适合于项目性操作,即通过口述史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培训,开展以“四史”为主题的口述史项目实践。以笔者口述史教学设计为例,在策划口述史项目时共设计了两个大的方向:其一,新中国成立前阶段“党史”主题,如设计“我的入党故事”“寻访抗战老兵”“土地改革记忆”等项目。其二,新中国阶段“四史”方向,这一方向又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1949—1966年阶段,包括“新中国合作社的兴起、发展及解体”“新中国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及家庭生活”,二是1966—1978年阶段,其主题为“‘文革’里的故事”,三是1978—1992年阶段,其主题为“改革开放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四是1992—2017年阶段,其主题为“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家庭与社会”,五是2017年至今,其主题为“新时代与新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实践过程中,学生处于项目操作的实践地位,而教师则处在宏观指导的地位,师生共同参与完成包括项目的选题、背景资料的搜集、潜在受访者的寻找、访谈以及访谈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全部内容。

(2)“四史”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分析与利用。其

主要目标:即通过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分析,实现学生对“四史”由感性到理性认知的深化,最终引导学生建立对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同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口述史料的利用率,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性论文。

“四史”教育授课形式也要从教师一言堂向问题启发式转变,在教学中要善于设疑引思,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在“四史”的学习实践中去思考和辨析,提高学习兴趣,勇于思考知识,勤于钻研理论。^①这也就是说在“四史”的教学中既要强调实践,同时也应注重学生的思考与研究。故此,针对目前一些学校所开展的口述史教学实践中重实践轻研究、成果利用率低的问题,口述史实践教学应注重口述史项目的开展与学生的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相结合,加强学生对其口述史项目成果的分析、整理与利用,以此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知之深爱之切,历史的学习不应仅仅停留在课堂知识的灌输,或者是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同时更重要的还应加强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四史”教育,更肩负着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使命,唯有在历史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加强历史的认知,如此方能更深层次的实现思政育人,使“四史”在学生心底落地生根。此外,在高校进行系统、规范的“四史”口述史实践教学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大学生源多来自全国各地,分布于不同的社区与社会阶层,而且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有一定的分析研究能力,组织其深入各自熟悉的环境开展口述历史项目可最大程度上保障所得口述史料的丰富性与典型性,以及史料的有效性。

(3)高校“四史”口述史教学的理论研究。其主要目标为探索与构建口述史教学的新模式;其面临及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口述史在历史教学中应用的意义、可行性、方法与路径、课程评估、困境与策略、教师角色等。

理论源于实践,同时指导实践。口述史教学理论对口述史教学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四史”口述史教学中应不断加强理论研究,针对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总结与反思教学中的经验与教训,所形成的研究性论文,不仅可为学界同行的口述史教学所参考借鉴,对进一步促进口述史教学的推广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如何针对不同的学习阶段、不同背景的学生制定差异化的教学目标,如何运用

①新诺:《围绕立德树人加强“四史”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0年第5期。

口述历史教学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此外,课程评估是口述历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系统检查教学效果的最好方式,而课程评估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何进行有效的评估也是口述历史教学中的重要议题。再如,“四史”口述史在高校教学中的实施途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四史”教育已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探讨,如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艳美探讨了“四史”教育在“纲要”课程中的落实问题。^①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文臣探讨了“四史”教育与“概论”课程的融入问题。^②而以口述史为实施途径的“四史”教育在高校的嵌入问题关注较少。应当说“四史”口述史在高校教学中的嵌入途径诸多,既可以嵌入如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历史学专业课,也可以“纲要”“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为载体,除了这些嵌入模式外,“四史”口述史课程化教学也是落实的重要途径。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的进一步实践与理论探讨。

(4)“四史”口述史料数据库建设。其主要目标:搜集整理“四史”口述史料,包括影像史料,建设“四史”口述史数据库及教学实验室;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分析和解决数据库及教学实验室的建设、管理、运行和主流媒体相结合等问题。

“四史”口述史教学中还应注意数据库及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史料是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们了解、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而这方面口述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官方文献及民间文书等文字史料历来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凭据,但此类文献史料却也存在诸多弊端,如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及人物,文献记载缺失或语焉不详,或仅是一面之词,难辨真伪。特别是官方文献档案资料多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宏观记录,在这种宏大的叙事模式下难以观察到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及其心态,加之多种原因造成的大量档案文献的散佚,也影响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口述史料作为文献史料的补充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相对于档案文献的宏观记述不同,口述史更多的是以“个人性”的呈现方式关注社会变迁中个体人的生存与情感,特别

是其“自下而上”的视角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制度变革下普通民众的行为、记忆及情感,从而构建起更为丰富、生动与多彩的历史图景。

上世纪8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口述史学即已步入大学殿堂,如在美国不但几乎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了口述史课程,而且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③相比之下,我国口述史学科建设相对落后。在高校开展系统、规范的口述史教学,不仅对推动教学改革有重要意义,同时一届届“四史”为主题的口述史项目所得口述资料,经日积月累,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口述史资料库。这一工作在最初口述史项目的开展时即应有一宏观的设计,有组织有计划地设计口述史项目的选题,在口述史项目完结之后,还应及时对所有口述史资料进行分组、归档,日积月累,以构建口述史数据库,既可保存国家、民族及民众记忆,又是教学的资料,同时亦可为学界“四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持。当然,数据库及历史教学实验室建设也面临如硬件配置升级、资源存储及跨学科人员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如要求教师既具备扎实的史学基础知识,同时又熟悉信息技术和影视多媒体技术相关操作,需要通过师资的培训来不断加强跨学科队伍的建设。^④

综而观之,以口述史项目为依托,通过口述史理论、方法的学习与培训,开展“四史”为主题的教学实践,不仅可以打破课堂与社会的界限,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同时也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训练与提升,而且所得口述史料即可为学生学年及毕业论文所参考,亦可为学界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支撑。高校“四史”口述史教学的开展应着重注意口述史项目实践、口述史资料整理与利用、口述史教学理论研究,以及“四史”口述史数据库建设四方面的问题;其总体目标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并通过教学实践最终实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资政育人的教学目标,同时探索与构建“四史”口述历史教学新模式;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口述史运用到教学实践,探索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的口述史教学的理论与方法。

(责任编辑:李月琴)

①孙艳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加强“四史”教育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期。

②王文臣:《“四史”教育融入“概论”课教学的内容切入与现实意义》,《思想政治课研究》2020年第5期。

③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④敖雪峰、吴琼等:《历史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经验及问题研究》,《实验科学与技术》2015年第6期。